

■新作聚焦

梅岱散文《明斯克钩沉》:

历史潮流的时代玄览

□古 昶

梅岱散文新作《明斯克钩沉》(《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记述了作家2013年秋天访问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见闻与感怀。这篇属于国际题材的作品,约计一万二千字,篇幅虽然不算很大,但内涵却丰赡超拔,不同凡响。其笔墨所至,不仅勾勒出异域景观,而且关联着人类命运;不仅激活了历史脉跳,而且扣动着时代节律;不仅传递出思想的震撼力,而且散发着艺术的感染力……所有这些交汇融合,最终化作摇曳缤纷、纵横跌宕的诗性表达,读来让人情潮起伏,思绪万千,有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觉。

正如作品题目所标示的,《明斯克钩沉》重在讲述沉埋在时光深处的明斯克的“城南旧事”。不过作家在从事这种讲述时,并非是静止地、单向度地发掘史实,追怀已逝,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鲜活新颖、也更具艺术匠心的方式和路径——在充分了解明斯克以及白俄罗斯历史,尤其是其近代史的基础上,把访问期间曾经亲历且印象极深的三个场景——与明斯克“80后”司机小伙子一席谈、参观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一大会议址博物馆和斯大林防线博物馆——置换为三个画面相对独立、题旨彼此呼应的长镜头,就此展开立足当下而又思接百年、物与神游而又神驰象外的描绘与感发,由此构成作家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异国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对话,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精神重量与艺术张力。

请看作品中“我”与异国司机深入交谈的长镜头。那位有点儿像北京“的哥政治家”的小伙子,由衷喜爱今日幸福安定的白俄罗斯。而当“我”向他询问幸福生活与自由自由的因果关系时,小伙子的回答竟然出人意料的深刻、辩证与警策:“自主、自由都是好东西,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我们更看重的是自主,而不是自由。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安排,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自主,哪来的自由?你在那里整天折腾要自由,谁能给你自由呢?自己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还谈自由,那不是南辕北辙吗?有自由没有自主,自由能牢靠吗?”

显然,“我”是小伙子的拥趸,也是小伙子的知音。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沿着小伙子开辟的思路,联系近年来发生在白俄罗斯邻国乌克兰的动荡和剧变,进一步剖析着西方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西方人

描绘的民主蓝图,当然游戏背后的操盘手也是西方,他们操纵木偶的提线,而不幸的乌克兰人像木偶一样的表演。无休无止的游行示威、广场集会,没完没了地烧汽车、砸商店,自由变成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变成‘橙色革命’。虽然得到西方政客们的廉价赞扬,虽然受到西方媒体的狂热欢呼,但民主的结果成为国家的灾难、老百姓的灾难。自由的游戏最终落进了一个难以脱身的无底陷阱,一个好端端的乌克兰陷入了暗淡无望的泥潭。”如此犀利辟透的言说,足以令读者醍醐灌顶,不仅瞬间明白了乌克兰悲剧的实质,而且很自然地开启了联想与诘问: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果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所携带的“基因性缺陷”我们该不该警惕?今日中国能否建成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文明形态?斯时,作品的主题走向了旷远与高迈。

作品中关于“我”参观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大会议址的长镜头,同样视野开阔,意味深长。俄国社会民主党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因此,该党一大就是苏共一大,而坐落于明斯克市中心广场一侧的该党一大会议址,也就是苏共的“产房”。

如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所崇敬的政党,由苏共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历史的车轮常常曲折前行,苏共在它93岁的时候,连同它经过浴血奋斗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一起轰然倒塌,上演了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大悲剧。正因为如此,作家——来自中国的拥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置身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苏共一大会议址,未免心境复杂,感慨万千,别有一种滋味。

一方面,对于苏共这个曾有近两千万党员的大党,因为失去了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党员的拥戴而大厦倾圮,作家感到由衷的惋惜和痛心,当然更多的还是深刻的警醒与反思,是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老话愈发真切的理解与体认。不过作家又坚信:历史注定不会把社会主义苏联曾经辉煌的一页彻底干净地抹除;全世界共产党人也不会轻易忘掉克里姆林宫红墙上那颗熠熠闪烁的红星。我们会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让共产主义运动朝着更加健康光明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面对苏共一大会议址,作家不禁联想到中共一大会议址和南湖红船,特别是联想到党的十九大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

到上海和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址和南湖红船的庄严情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铿锵有力的誓言,使作家“感动万分而热泪盈眶”,同时也自信满满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次新的长征。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对历史沉思,向历史追问,正视苏共的悲剧和教训,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把人民的事业推向高潮,引向胜利。

作品描写“我”参观斯大林防线博物馆即该防线遗址的长镜头,亦别有感悟和洞见,值得仔细品味。斯大林防线是苏联当年在西部边境为防御德国法西斯而修筑的军事工程。围绕这一工程的修建,出现过若干堪称吊诡的历史事件,其结果是耗费巨大、固若金汤的防线,却未能阻止侵略者的突然袭击。对于这段历史以及相关说法,作家进行了扼要的介绍与睿智的评说,但却没有就此止笔,而是在此基础上,将思绪扩展到“世界上曾经有过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甚至还在不断修筑的各种各样的防线和‘围墙’”。如德国已经倒塌的柏林墙、巴勒斯坦拉姆拉用水泥板筑就的隔离墙,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竖起的难民墙等。在作家看来,所有这些有形之墙的背后,都有一堵无形之墙,它们意味着隔膜、分离、芥蒂、纠纷乃至仇恨,阻碍的是人类精神、情感和文化的交流,是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而在已是“地球村”的今天,修路架桥,互联互通,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才是人间正道。读

《明斯克钩沉》在充分了解明斯克以及白俄罗斯历史,尤其是其近代史的基础上,把访问期间亲历且印象极深的三个场景置换为三个画面相对独立、题旨彼此呼应的长镜头,就此展开立足当下而又思接百年、物与神游而又神驰象外的描绘与感发,由此构成作家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异国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对话。



明斯克风光



2018.4

人民文学



着如此洞明澄澈的文字,我们不禁更加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也更加理解了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的宏伟方略。于是,作品的题旨又一次接通了时代潮汐和人类命运,进而升腾起风云激荡的大气象。“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当年冰心所集冀定庵之句,庶几可以作为作家心灵的写照吧?

《明斯克钩沉》承载着深刻的社会主题和丰沛的历史内涵,但却没有因此就忽略作品的审美表达。在这方面,作家同样寄寓了潜心斟酌和苦心经营,并收到了良好效果。

首先,作家善于运用心中储存的表象和经验,把密集的思想元素同鲜活的形象、生动的场景以及特定氛围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有我之境”。譬如,有关自由与自主的精见卓识联系着侃侃而谈的司机小伙子;苏共过山车般的命运悲幻化为冷清而凄凉的木质房舍;而作为二战时期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之精神象征的,应该是那位迄今仍穿着当年苏联红军军装的博物馆讲解员。所有这些,连同明斯克市内宽阔整齐的林荫大道、红花树绿的袖珍公园、窈窕妩媚的清纯少女,最终构成既有

魅力又有深度的明斯克风景,足以让人在如临其境之余浮想联翩,兴味绵绵。

其次,作家具备充分自觉的文体意识,娴熟地调节和驾驭着作品的笔墨色彩与叙事节奏。全篇以三个长镜头为基本构架,而每一个长镜头都在突出其焦点内容的同时,斜出旁逸,穿插进一些建立在联想基础上的知识性或背景式的陈述。譬如,在写到苏共一大会议址时,很自然地介绍了我党一大以及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在写到明斯克的斯大林防线时,不失时机地引出了我国的长城和法国的马其顿防线。而在拉开三个长镜头之前,作家首先介绍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小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相互关系。这种扩展性书写不仅延伸了作品内涵,而且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最后,却是极重要的:整篇作品的主旨和意蕴虽然高远博大,厚重雄浑,但作者在表达这一切时全不见那种居高临下而无当的空洞说教,而代之以平实亲切,推心置腹的叙事口吻。即坚持从作家自己的认知与感受出发,或娓娓道来,或鞭辟入里,真诚地与读者对话交流。于是,作品生成了一种朴素自然的风度,一种大美无形的境界,让人读过之后,久久回味,久久难忘。记得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美是显现真理的一种方式。”梅岱的散文《明斯克钩沉》,庶几可作如是观。

■新作快评 肖勤中篇小说《亲爱的树》,《民族文学》2018年第4期

唯其脆弱,才有力量

□兴 安

从《暖》到《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肖勤的创作越来越有声色,叙述洒脱,自然而有节制,语言也愈发简洁而有意韵。她在悄悄地进步,静静地扩展和变化着自己的视角和领域。但是,她关注现实,体察民生,关怀弱势群体,主旨和情感却一直没有改变,反而愈发地深刻而真切。中篇小说《亲爱的树》(见《民族文学》2018年第4期)便是她的最新收获。

作为中篇小说,《亲爱的树》篇幅不长,故事也不复杂,人物关系也比较鲜明清晰,但是小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却如暗流涌动般酝酿升腾,布满全篇。小说的主角照野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老实巴交的工人,一生循规蹈矩,无声无息,被妻子树儿称为一辈子“任由人揉”的“软绵绵”的“棉花”。他初中毕业后正赶上全国支持三线建设,他响应号召,走进荒漠里的保密军工厂。四年后,阴差阳错被退回地方当了拖拉机厂的工人。改革开放后,他又被朋友拉着做沙发生意,最后落脚在冥货铺,为亡人做寿殓品。老贺是照野生活中惟一的朋友,也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人物,甚至是推动他人人生走向与变化的一个外动力,让照野在被动中完成着自身的宿命。从退出三线到学做沙发,再到开设冥货铺,都是贺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或陪伴左右。照野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树儿,一个是枝儿,两人虽为亲姐妹,但心性却迥然不同。树儿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可惜结婚两年便因宫外孕死去,但在他的心中,她并没有离去,一直陪伴着他,就等同院子那棵木槿树。而枝儿却是一个陷阱,外号“大扫荡”,一个想方设法“吃定了他”的有心机的女人,由此也酿就了他后半生的痛苦和悲哀。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明生,一个似乎在故事中从始至终没有站起来,肥胖得像一坨“软体动物”的家伙,是故事中一个毫无美感的“恶之花”。他本是酒鬼、赌徒的儿子,母亲早死,父亲给他找了个继母,就是枝儿。父亲因为赌光了公司的收款而进了班房,房子也被没收,母子俩便抓住了照野这

根稻草,死皮赖脸地搬进了他的家,而屋子的真正主人照野却被挤到了过道,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凑到了一起,一直过了42年。小说无意探讨血缘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影响,而是力图揭示人性中善与恶之间的较量。照野是一个有善根的人,所谓不贪、不嗔、不痴。他不仅对枝儿的欺压以及明生的鄙夷逆来顺受,而且将他们以亲人相待,舍己而为他们母子。明生绝对是一个积有恶根的人,用老贺的话是“猪投胎”,从小照野便像对亲儿子一样供养他,却始终没能换来一次好脸色、一句好话,在他们母子面前,他永远是被称为唤去“喂”。以至最终以小孙子为要挟,企图霸占他视为命根的小院,薄情寡义到了极致。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每每为照野这个人鸣不平,为什么如此善良无私的一个好人,却常常得到不公正的境遇与回应?而“善”在面对“恶”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变得脆弱而无能?记得多年前我看过一本美国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写的书,叫《善的脆弱性》,书中探讨了人在无法掌控命运时,“善”所经受的胆怯、脆弱与困境。照野的内心是善的,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懦弱、隐忍和自我。工作中他被老贺牵引,亦步亦趋,无怨无悔;生活中他被枝儿、明生挟持或戏弄,狼狽不堪,无地自容。当然,照野的“善”也是有底线的,就是那棵院子里的木槿树,它是亡妻树儿的化身,谁也不许打它的主意,但是明生所代表的“恶”,又带有“无赖”的特征,强词夺理,寡廉鲜耻,一步步将照野逼入走头无路的人生困境。我以为,在照野身上充分体现了善的“脆弱性”和无力感。尤其当“善”的主体缺乏力量维护自身的时候,反而滋长或纵容了恶的生长,所以,此时的“善”只能威信扫地,与主人公一起成为一场悲剧的点缀。

令人意外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设置了一个类似反转式的高潮,就是让14岁的小孙子江河站出来,道出他那个年龄本不可能有的惊人语:“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思维——你可以把产权让给我,我保

证不砍树。说实话,产权给他们俩个,实在是靠不住,以前他们啃你,以后肯定是啃院子——产权迟早给他们吃空花尽,给我呢,至少我可以拿去动手术(文中交代,小孙子有先天性心脏病,18岁时要进行手术。)——等我18岁的时候。总之,我爸我妈咱俩都不靠,不如咱们自己玩。”

小江河毕竟是照野亲手带大的,尽管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孩子的心里是清楚的,尽管他的表达过于直接,也含有功利性,但从中照野终于感受到了善与亲情的力量,也体会到了恶有恶报的因果逻辑。当然,在我看来,孩子的揭竿而起或许是作者理想化的一个愿望和对弱者的道义支持,或者是文学想象为绝望的现实增添的一个希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听到了公正的声音。

小说的结尾非常让我感触。照野与老贺这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留宿在冥货铺,烤着炭火,回味着自己的一生。小说写道:“二十平米的冥货铺,柜架上塞满香烛、阴币、纸钱和寿衣老被,柜台里也是。中间一个小过道,睡上一个他,有一点活人横在棺材里的感觉,这叫向死而生呢,还是视死如归?都不像,没那么坚强。他想,如果将这冥货铺当成火化炉,一把火烧下去,合着这么多冥人冥器纸洋,得烧多久?顶上这片天会不会灼得唤痛?一丝丝老旧细弱的心思,长长短短地,交错着悲欢离合,与夜里野猫过路凄凉的叫声合在一起,有点像做道场时的高高低低婉转曲折安魂归西的唱经。”

一个饱经屈辱的老人,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终于找得了自我和安宁。此刻,人无须坚强,此刻,人更多的是需要看破生死阴阳,看淡人生长短。这一场景,如同一次庄严的演出,又是一次安详的谢幕,让我们看到这个脆弱而又卑微的老人积攒一生的能量的喷发。借用玛莎·努斯鲍姆的一句话,作为对照野这个人物的致敬:“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和高贵。”

■评论

重拾碎片记忆 凭悼芳华时代

——评方英文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 □曹昱陆

方英文新作《群山绝响》以极为宽广深厚的人文视野开启了青春感怀、中年怀旧的书写新模式。小说在重拾碎片记忆的诗意表达中,追思了一代人的芳华记忆,传递出对远去时代的无限凭悼。

《群山绝响》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方英文在重拾历史、生活的碎片记忆中,为读者讲述了一群正值芳华的少年男女元尚婴、田健康、马广玲等人,他们正值青春萌芽期,伴随他们不断成长的是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和人生命运的种种考验。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但各人人生的归宿却有些出人意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群山绝响》囊括了作者的青春期与成长期,这是他在40余年后回望这段乡村生活经历时,将“泪流满面”的复杂情感孕育笔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现实文本。

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少年视角的运用。在《群山绝响》中,作者以小说主人公元尚婴的角度展开叙述。作者将日常生活的琐碎融注到极具时代性的革命色彩中,写出了现实的无奈与命运对人的捉弄,带给人一种无言的感怀和丝丝阵痛。特别是在对元尚婴的人生轨迹讲述中,让人遐想不断。小说写到初中毕业的元尚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想上高中却困难重重。母亲游说,他能够被推荐上高中,不惜用鸡蛋、粮票、腊肉等物品去四下活动,尽力奔走,这不仅体现了一位农村妇女的处世哲学,而且也展现了一种现实的乡村世情。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元尚婴还是未能被推荐上高中,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但生活总是这样反复无常,机缘巧合的是,同学意外落水他又被补录进了汉叔中学。在后来的高中学习生活中,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表现不俗,因而被书记点名推荐,去替补牺牲邮递员吴小根的空缺。但事情又发生了转折,因为同学的嫉妒报复,他又被退回,只能回乡务农。这种以少年成长为精神原点的叙述,不仅让文本浸染着青春的气息,而且进一步拓宽了小说的叙事向度,让读者在回味过往的空隙间洗涤着心灵。

回看元尚婴人生踪迹,其与农村存在着一种“归来——离去——再归来”的曲折线路图,如此命运似可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相比较。但是元尚婴又和高加林有本质差异,差异在于二者对待苦难的不同上。高加林具有不满现状、竭力奋斗,打

回原地后情绪低落、满怀抱怨;面对近似的遭遇,元尚婴则是不急不躁,淡然处之。因为他出身不好,中学老师的父亲又被开除回家。这使一个阅历尚浅的少年不由自主地过早地成了宿命论者,否则,难道自杀不成?于是他采用了对自己命运的高度认同感,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甘心情愿融入广大的农民群体,并认为这么活着就很好,压根儿没必要奋斗啊抗争啊什么的。这正是方英文与路遥的根本不同。路遥写的是“奋斗小说”,方英文写的是“天命小说”——也许寄寓着作者的某种陶渊明思想吧。认命,苦中作乐,也就不乏“穷快活”——这正是中国人的无奈,也正因此而具有了强韧的生存繁衍力。

从《群山绝响》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颇受道家影响,对小说人物的成长编排,一切显得自然而然,顺势而为。另一方面也或许与作者的心境有关。作为一部具有怀旧色彩的小说,作者以介入文本的姿态进行叙述,使小说难免沾染了作者中年叙事的写作风格。当然,这更与作者本人对人生的体悟有关,从而使小说显得质朴真切,与众不同。

除了少年视角,小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对传统家族文化的书写。元家是一个世代吃斋念佛、乐善好施、重视传统礼义法度的仁义之家。小说中的爷爷元占有了无疑是这个家族的灵魂式人物,他在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光如此,他的仁义厚道更是享誉十里八乡。无论是陌生路人的热情招待还是请遭遇丧女之痛的表伯表娘来家里吃顿饭,小说都写得细致入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小说在读者早已习惯的笔法、文风、幽默叙述腔调中,让读者又一次领略了“方式”风格的独特魅力。此外,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有着对传统家庭等级观念的描绘。作者似乎有意将日渐衰微的家族文化镶嵌到了小说的日常书写中,为读者重构了乡村伦理中的家族文化,勾勒一种渐微式的传统体验美学。

总的来看,《群山绝响》是方英文的自我革新之作。小说在作者老到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回望了历史和特殊事件的生活节点,以节制的情感进行了怀旧。在凭悼一个时代的同时,展现了一代人的别样芳华。这是作者创作经验的自我提升,也是寻求突破的权宜策略。更重要的是,作者笔下透露出了对远去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观照,发出了一个被誉为“绝响”的悠远回声。